

浅析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

李晓兰

摘要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疑罪”案件中的一种类型,本文将从这类案件的内涵入手,论述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处理情况及其完善。

关键词 疑罪从无 证据不足 事实不清

作者简介 李晓兰,厦门大学法学院 2007 级诉讼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0-106-02

2005 年 3 月 28 日,曾被政法部门认定在 11 年前被丈夫余祥林杀害的京山县雁门口镇居民张在玉突然归来,这立即成为当地一大轰动性新闻事件,有关媒体也作了报道。这表明,余祥林因故意杀人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成为错案。类似于余祥林杀妻案这种造成较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还有很多,典型的包括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冤案、云南滕兴善杀人冤案、民警杜培武杀妻冤案等等。其中,聂树斌强奸杀人冤案,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10 年后,真凶落网,聂树斌的冤情得以曝光。滕兴善杀人冤案,在滕兴善被执行死刑 2 年后,“被害人”石小荣回到家中,于是经过家属 16 年漫长的申诉路,2006 年 11 月 8 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作出再审判,原审被告人滕兴善被宣告无罪。杜培武杀妻冤案,在杜培武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在监狱服刑之后,杀害杜培武妻子的真凶被抓获,被告人杜培武于 2000 年 7 月 6 日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法院宣布当庭释放被告人杜培武,由此杜培武一案在全国造成轰动。

上文提到的几起错案,无不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司法腐败,就是因为这样的案件频繁发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更慎重、更严谨地对待各类刑事案件,特别是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诉讼效率将案件草率地移送法院,给冤假错案制造源头。

一、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涵义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是指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刑事案件,经过检察机关审查,证据不能或者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被指控行为,或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疑罪”案件中的一种类型。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无法回溯案件的原貌。虽然人类认识能力在不断提高,但仍然不能解决部分案件事实不清的问题。对此,“除非我们想瘫痪整个刑事司法,否则不可能要求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必须做到一个摄像式的事实重建”。因而,人们面对的现实性问题并未改变,在遇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时,依旧要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难困惑中进行艰难的抉择。

二、司法实践中对审查起诉阶段证据不足案件的处理

司法实践中遇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不足案件,处理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一)退回补充侦查

退回补充侦查是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对证据不足案件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遇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除非刑事案件的查实已无任何可能,一般会建议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且用足补充侦查的次数。退回补充侦查时,检察机关会明确侦查方向,向公安机关说明需要补充的证据,从而为提起公诉提供条件。

(二)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对于已经没有任何侦查空间的案件或者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被执行逮捕,检察机关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后,检察机关会要求其发现新的事实或证据时出现移送。若现有证据能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治安行政处罚或者做其他处分,检察机关也会建议公安机关作相应处理。

(三)作不起诉决定

因证据不足而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又称为存疑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 1996 年修改之后新增加的一种不起诉类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四)提起公诉

极少数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检察机关会提起公诉。这是因为某些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秉持着“疑罪从轻”原则办理案件。“疑罪从轻”,也称为“存疑从轻”,是指司法机关因为证据等方面的原因,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产生犹豫,而出于种种考虑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但从轻处罚。

“疑罪从轻”是以从轻处罚为代价达到不让犯罪分子逃脱法网的效果,是司法人员一种成本较低的最佳选择。审查起诉中某些故意杀人案、抢劫案、强奸案等案情重大、影响比较恶劣的证据不足案件,已经处于退无可退、查无可查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被指控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与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此时,检察机关若处于追求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目标,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社会公众会担心司法机关放纵犯罪,检察机关就会招来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在遇到这类案件是,一方面,司法人员会顾忌社会影响,会害怕社会舆论的不满,会担心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及错案追究机制等因素;另一方面,受我国长期的“重刑”思想影响,时下我国社会大众对于打击犯罪的要求大于制约司法权力的要求,而且我国司法机关的侦查、调查案情的手段不够先进,司法制度还不完善,不采用

“疑罪从轻”,极有可能放在犯罪。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处理社会影响较大的证据不足案件,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与认定无罪相比,不仅在成本上低很多,而且对司法人员自身而言还较为安全。因此,少数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对某些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存在一定的“博弈”思想,即与其应为不诉或者建议撤案承担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的风险,还不如“留有余地”的轻诉。

上文提到的余祥林杀妻冤案、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冤案、云南滕兴善杀人冤案、民警杜培武杀妻冤案,这几起造成极大社会负面影响、给司法机关形象抹黑的案件,都是由于司法人员秉持着“疑罪从轻”原则办案。基于“疑罪从轻”原则,公安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没有主动撤案,检察机关明知证据不足仍然提起公诉,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留有余地”的轻判。以上种种因素环环相扣,最终“制造”出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三、审查起诉中证据不足案件处理方法的完善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要通过上文提到的前三种方式处理。检察机关基于“疑罪从轻”原则而对证据不足案件提起公诉的做法,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为了杜绝检察机关对证据不足案件提起公诉的做法,从源头上遏制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处理审查起诉中的证据不足案件时,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谨慎对待证据不足案件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遇到证据不足案件时,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具体作出相应的处理。首先,在涉及犯罪成立与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首先应当退回补充侦查,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之后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或者作不起诉决定。其次,当涉及此罪与彼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根据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应当作出成立轻罪的结论。最后,当涉及量刑情节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也应当根据存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来作出决定。若是涉及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事实不清,视为案件事实存在;若是涉及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事实不清,视为案件事实不成立。

(二)杜绝有罪推定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刑讯逼供被合法化和制度化,虽然当时刑讯逼供的存在有着司法力量薄弱和刑侦技术落后的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法文化当中。中国古代奉行有罪推定的思想,例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在重罪与轻罪之间“重轻罪”,唐律明确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等”。这一思想体现在古代纠问式诉讼中,就是大多数刑事案件都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

封建纠问式诉讼中有罪推定的思想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当中,一直延续到现在。一些检察官受这一思想影响,在审视犯罪嫌疑人时戴上了“有色眼镜”,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实施了犯罪的人。于是,在审查起诉中遇到证据不足的案件时,害怕放纵犯罪,不敢作出不起诉决定,也不敢建议公安机关撤诉,而是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仍然提起公诉。这也就给冤假错案制造了源头。为了避免更多的“余祥林”、“杜培武”出现,检察机关在

审查起诉中遇到证据不足的案件时,就必须杜绝有罪推定思想,要按照案件现有证据客观公正地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一旦发现案件现有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就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三)改善现有法制环境

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使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国民普遍对政府的权力抱有很高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希望拥有刑罚权的公权力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侦查、起诉与审判,承担起保护国民的义务。尽管随着国家拥有愈来愈大的刑罚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产生非常大的威胁,但是为了获取生存的安全,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的人们愿意付出牺牲自由和权利的代价。因此当犯罪行为发生时,人们往往对之表现出极大的憎恶和恐惧,普遍关注的仅仅是案件是否侦破、罪犯是否受到惩罚、法院判决的结果是否会使潜在的犯罪人回到社会,而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在重安全轻自由这种传统心理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对证据不足案件不提起公诉,可能会将潜在的犯罪人释放到社会,对公众安全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因此,一些社会影响极大、媒体公众极为关注的证据不足案件,一旦检察官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就不得不面对舆论的压力。为了避免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质疑,为了公民安全不受任何潜在的威胁,检察机关通常不愿意作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而是对这类案件提起公诉,将问题抛给法院。另外,重安全轻自由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稳定有着极高的要求,而我国的检察机关又不是完全独立的,各级检察院实际上受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制约。因此,一旦公众认为检察机关不对案件提起公诉会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进而给检察机关施加舆论压力的时候,检察机关考虑到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稳定的重视,一般都会妥协,对这类案件提起公诉。

为了逐渐改变我国民众重安全轻自由的思想,现阶段必须改善目前的法制环境。当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司法体制逐步健全、法制环境逐渐改善时,对违法犯罪行为才能够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罪的人会得到法律的惩处,无罪的人不会受到无妄之灾,而证据不足的案件在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能够及时予以追诉。在这种良好的法制环境下,民众的安全感才会慢慢提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恐惧感会日益降低,而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则会逐步增加。当民众渴望自由和权利时,才会更加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才会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可无罪推定的精神和原则。这时候,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处理证据不足的案件时,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因为民众在心理上觉得自己目前所处的法制环境是安全的,对检察机关的这种决定就不会出现过度甚至是过激的反应,检察机关也不用迫于压力而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强行提起公诉。

参考文献:

[1]蔡圣伟.论罪疑唯轻原则之本质及其适用.陈泽宪.刑事法前沿(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2]刘晓东,雷小政.有罪推定基本问题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5(5).